



阳泉市党史资料丛书

抗日战争中的 阳 泉

中共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阳泉党史资料丛书

抗日战争中的阳泉

(回忆录)

下 册

中共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

一九八五年八月

平定路北的牺盟会

赵 艾 夫

抗日战争时期，平定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第一任秘书（领导人）是甄吉仁同志，他因病去世有十几年了。第二任秘书就是我。由我回忆平定县路北牺盟会的斗争史是责无旁贷的。当我提笔的时候，不由的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他们手中窃取的权力，信口雌黄，硬说牺盟会是反动组织，对我参加和领导牺盟会的这段历史，非要当作参加和领导反动组织加以追查不可，逼着要我写出交待。这是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妄图打倒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忠于党的领导干部所施行的鬼蜮伎俩。但是也有一些缺乏常识的年青人，把复杂的历史情况简单化、公式化，认为牺盟会既是山西反动统治者阎

锡山办的公开合法组织，它就一定是反动的。为了消除这种误解，回击林彪“四人帮”对牺盟会的诬陷，有必要交待一下牺盟会的由来。

牺盟会是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后，山西统治阶级同共产党、日本、国民党三种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阎锡山亲自批准成立的一个进步的抗日群众组织。为什么阎锡山要批准成立进步组织，这就必须分析当时的形势。

第一、“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山西广大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逐渐高涨。1935年冬，我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发动和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抗日战争。1936年春，红军东渡抗日进入山西，宣传党的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撒下了革命的种子，震撼了阎锡山的统治，鼓舞和支持了山西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广大群众觉得有了奔头，要跟共产党走，群众爱国热情象熊熊烈火到处燃烧起来，形成了一股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锡阎山深深感到，再用老办法镇压群

众运动，他们的统治就难于继续下去了。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接着又侵占了冀东。1936年冬天，又发动了向绥东百灵庙地区的侵略，直接威胁到山西。阎锡山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当汉奸卖国贼吧，不仅要被人唾骂，而且保不住多年搜刮来的亿万家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要保产，要保产就得抵抗日本的侵略。

第三、蒋介石向山西伸手，派特务，搞河东道独立运动挖阎锡山的墙角是由来已久的，阎锡山早已心中有数了。更恼火的是蒋介石乘红军东渡之机，派关麟征带领五个师驻在晋南赖着不走。这种威胁增加了阎锡山的忧虑和恐惧。

阎锡山面对着共产党要“赤化”，日本人要“共荣”，国民党要吞并这三种矛盾，怎么办？根据他“一切为了存在”的反动哲学，悟出了一条独特的反动路线，这就是：抗日又随时准备降日，联共又随时准备反共，拥蒋实际上是在抗蒋。按照他幻想的这条路线，便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了“联共”、“抗日”的

“新政策”。高喊“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并于1936年9月邀请薄一波同志回山西来领导抗日救亡工作，要“用共产党来发展自己”。这就是阎锡山以进步掩护反动，以假左粉饰真右，以革命维持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批准成立牺盟会也是其两面派手法之一。

1936年“九·一八”五周年的时候，阎锡山亲自批准成立牺盟会。不久就被我党接受过来了。表面上牺盟会仍是一个“官办”形式的组织，它可以公开合法的活动，实际上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革命的进步群众组织，是一个最广泛的群众性的组织。这个组织为我党在山西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它可以发动群众抗日，它可以参政，它可以组织自卫武装，它很快就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力量。我们充分利用这个“官办”组织形式，吸收了山西以至全国各地的抗日进步青年、学生，培训了大批干部派往各地，如牺盟特派员（县领导人）、村政协助员等，同时还成立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这不仅有计划地配备了党在山西各地的领

导力量，而且为组建山西的决死队（新军）准备了骨干。

平定路北的牺盟会，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七·七”事变前一些大村镇就建立了牺盟会组织，如荫营、三泉等村。日寇打进娘子关之后，大部分基层牺盟会停止了活动，有的村牺盟会干部，离开本村参加了工作，走上了抗日的前线。1938年7月，平定县佐公署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首先建立了平定县牺盟会，秘书由甄吉仁同志担任。县牺盟会成立后，逐步把各村的牺盟会恢复和建立起来。我记得郝家庄的王揖礼，岳家庄的岳真，理家庄的王维之，秋林的王锡庭，北头岭的梁月亭，南山沟的赵贵，董寨的董云祥等都是比较早的村牺盟会秘书。由于这个组织早已举起了抗日的旗帜，在群众中有很深的影响，同时它又是“官办”的公开合法组织，在抗战初期为我们深入各地，深入群众，发动组织群众抗日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通过牺盟会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到1939年春天，各村基本上都组织起工人救国会、

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成为牺盟会的团体会员。1939年春我在县牺盟会担任宣传部长，高汉卿同志担任组织部长。

1939年夏秋之交，晋察冀边区开过一次晋东北各县牺盟会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县委派我去参加。主持会议的是陈一凡、李希庚、袁向前等同志。会议要求各地整顿组织，大力发展会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认真贯彻了会议精神。随着牺盟会基层组织的巩固和扩大，于1939年10月建立了区牺盟分会的组织。一区分会秘书由岳真同志担任，二区分会的秘书由张建仁同志担任，三区分会秘书由刘建卿同志（女）担任，四区分会秘书由高智卿同志担任。五区因为环境不好，没有派人。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9年底上级党委决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一律脱离牺盟会而单独活动，牺盟会从此就成为一个上层统一战线组织了。

随着组织形式的变动，牺盟会工作任务的相对

减少，党在牺盟会系统抽调了一批党员干部，建立党的区委会，加强党的工作。1940年春调张建仁同志任二区区委书记，调刘建卿同志任三区区委书记，调高汉卿同志任四区区委书记，调高智卿同志任五区区委书记。调出的同志统统在区牺盟分会的掩护下进行党的工作。此外还有南山沟的赵贵同志，土吊沟的段文太同志，郝家庄的王揖礼同志等也都先后调出牺盟会，担任了重要工作。

1940年夏天，县委派我和尹达明同志在秋林举办过一期全县小学教员训练班。实到六十多人，绝大多数是牺盟会员。所以这期训练班实际上是一次牺盟会骨干和积极分子训练班。训练时间半个月，主要是讲抗战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以坚定他们的抗日信心。同时还讲了如何做好牺盟会工作的问题。在训练班还发展了二十多个党员，这不仅加强了牺盟会的基层工作，而且为有些农村建党打下了初步基础。

1941年6月，甄吉仁同志调县委会工作，由我担任县牺盟会秘书，这时王英、王平东同志（都

是三泉人)相继到县牺盟会搞组织、宣传工作。1942年6月,我调任县抗联会主任,即由王英同志任县牺盟会秘书兼县抗联会的统战部长。自1939年冬牺盟会成为上层统一战线组织之后,我们在教育团结上层人士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积极发展牺盟会员。只要是赞成抗日的教师、学生、在乡知识分子、乡绅、地主富农等,都主动吸收他们入会,使他们有个接受抗日教育的地方。这样一来,三区的全部,一、二区的大部,四、五区的一部分村庄的上层人士基本上都加入了牺盟会。如三区西家庄的王仲才(地主、国民党党员)、郝家庄的王希让(事变前的区长)、四区三泉村的聂士如(中学英文教员)等知名人士都参加了牺盟会。

第二、加强会员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是分区召开座谈会。内容主要是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积极交纳各种抗日负担是爱国的实际行动等。对敌占区的上层人士,主要是进行个别访问,争取他们抗日或不做坏事。这项工作主要由区、县

负责干部去进行。如一区区长李煦明同志曾做过巨城伪村长郝宾的工作；武工队政委张浩昌同志曾做过荫营村伪村长任静山、白泉维持会长郭健的工作。我于1940年春夏之交，通过二区牺盟会分会张建仁同志父亲的关系，到磨河滩访问过娘子关的维持会长段礼庭，他是事变前平定县中学的校长。我主要对他讲了抗战必胜的道理，要他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当时虽然谈话的效果不大，但我们的行动，对扩大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和八路军、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经过较长的时间和各方面的工作，在上层中出现了不少开明人士。如郝家庄地主王寿猫的老婆寿猫老人，是个管家的地主婆，她拥护共产党，带头积极交纳合理负担、公粮等，热情接待干部、战士，远近闻名。三泉村的聂士如，抗战前他是平定县中学的英文教师，坚决不给日本鬼子做事，积极从事抗日活动，1940年夏秋之交，被聘为出席边区参议会的代表。北头岭的梁月亭，被选为人民代表。但是，也出了个别的败类。如西家庄

的王仲才，表面上拥护抗日，暗地里却发展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受到人民的惩罚。

抗战中的堡垒村和堡垒户

赵艾夫 刘三祥

堡垒村和堡垒户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和敌人进行长期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在堡垒村里必然有若干堡垒户做骨干，用他们的勇于自我牺牲，不怕任何困难的模范行动，带领、影响和团结广大群众坚持抗日。这些堡垒户多数是党员、干部家庭，也有少数是上层人士的家庭。在平定路北抗日战争中有名的堡垒村，如一区的北庄头、岳家庄，二区的黄统岭、南山沟，三区的郝家庄、理家庄，四区的东、西墙，五区的燕龛、任家峪、邓家峪等。这些村庄有坚强的党支部领导，群众有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各阶层的人民团结一致为了抗日救国的目标共同奋斗。这些村庄在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都曾谱写过自己的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斗争史，都为抗日做出了重大的牺牲。我们凭仗这样的

堡垒村，前进就有了可靠的阵地，后退就成为埋在敌人心脏的定时炸弹。他们是平定路北坚持八年抗战的支柱。这里特回顾一下郝家庄这个堡垒村和堡垒户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郝家庄地处三区的腹部。南经岔口、岳家庄通巨城，北经狮子城、孤山可达河北的平山县，东经西家庄、神灵台可到河北的井陘县，西经理家庄可达孟县城。全村两百多户人家，一千多亩可耕地。周围的东峪、甘泉井、老峪、阴河等自然村都属郝家庄，在抗日时期虽然都分为独立的村庄，但一些大事还是看着郝家庄的动向办理。这样一个大村，又是交通枢纽，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动态，对方圆几十里地以内的村庄都有很大影响，加之他又是挂了牌子的平定抗日县政府的所在地，在敌占区以及邻县地区都是很有名气的。它实际是晋察冀边区四分区的一个南大门。

对这样一个村子，日寇是要千方百计地推行“治安强化”，摧毁抗日力量的。早在1937年冬，日本鬼子刚刚打进娘子关，占领了石太线还没有稳住

脚，就派“皇军”光顾过郝家庄。鬼子在周围的山头上放肆地打枪打炮，对郝家庄和周围山庄的人民，进行武装示威，妄图威胁群众，拜倒在“皇军”的威严之下当顺民。但郝家庄的人民并没有被吓倒，相反地更加激起了群众想方设法不当亡国奴的爱国之情，并为此而酝酿奔走和进行串连活动。在这关键时刻，1938年春夏之交，共产党领导下的平定县佐公署在郝家庄成立了，从此这个抗日县政府的牌子就挂在了郝家庄。群众有了这个抗日的主心骨，便相继组织起抗日的村政府，抗日的群众组织等。抗日村政府的第一任村长是王槐元同志，抗日群众组织牺盟会的秘书是王揖礼。在他们的领导下开展了各项抗日工作，高高举起了抗日旗帜。从此日寇就对郝家庄开始了一次又一次残酷的进攻和扫荡。1938年9月的一天，敌人对郝家庄进行了第一次大烧杀。杀死了妇女老人近二十人，烧毁房屋数百间。接着冬天又扫荡一次。从此以后年年“光顾”，有时甚至一个月就进攻几次。1939年的7月15日，1940年的11月29日，1941年的阴历正月

19日和11月16日,1942年的阴历3月21日,这些日子都是郝家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血腥纪念日。日本鬼子每次进攻郝家庄都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以1941年11月16日和1942年阴历3月21日为例,两次共杀死群众二十七人。其中有自然村甘泉井的五户被全部杀光。特别值得怀念的是,在阴历3月21日这次扫荡中,我三区青抗先队长二十岁的王曙光同志被鬼子杀死;我甘泉村的党支部书记刘友孩同志,被日本鬼子的洋狗活活咬死。以上说的是日寇专门对郝家庄的进攻和扫荡,进攻别的地方路过郝家庄以及1941年秋季大扫荡鬼子驻在郝家庄的两个多月都没有算在里边。

郝家庄人民在敌人的频繁进攻和残酷的扫荡面前,并没有屈服,相反地却锻炼成长起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和一支英勇顽强的民兵队伍。1939年郝家庄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到1942年发展成为有二十多个党员的大支部,当时王九玉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公开职务是村武委会主任。万孩(党员)任村长,王揖礼(党员)是牺盟会秘书,后任党的小区执

委；王吉功同志是村农救会主任。王敬才（党员）任青救会主任；王元寿（党员）任工会主任；杨玉庆（党员）任村妇救会主任；刘三祥（党员）是村里的小学教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照常完成了各项抗日工作。更为艰巨的是领导群众坚壁清野，有计划地转移，打击敌人，保卫群众的生命财产。1938年到1939年敌人进攻时，主要是领导群众往附近的自然村老峪、富老、池沟、黄沙浸等地转移。随着斗争形势日益尖锐残酷的需要，支部领导群众打暗窑洞，一般都筑在山沟梯田的地墙里，有土窑，有石头修的窑，外面伪装的和地墙一样，看不出里面有窑洞，人畜都可以躲在里边。到1941年以后，已做到家家有暗窑，在情况紧张的时候，群众晚上都住在暗窑里，白天才回村或进行生产，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敌人进攻时的损失。

1943年秋，鬼子进驻岔口村以后随时都可以进郝家庄来“强化治安”。郝家庄人民仍然斗志昂扬，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村基干民兵，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把通往岔口的路上和铁矿石